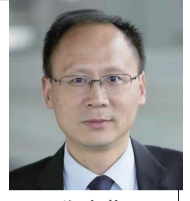


# “后默克尔时代”，谁掌德国“方向盘”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郑春荣

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9月26日落下帷幕，这是16年来首次没有默克尔参加的大选。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以微弱优势领先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开始艰难的组阁谈判。人们短时间内还无法确定默克尔的接班人是谁。“后默克尔时代”，德国政策走向如何？我们请专家为您解读。



郑春荣

——编者

**问：德国新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方式组阁？谁能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

**答：**大选结果排除了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组成左翼联盟的可能性，因为三者的得票率相加，未能达到组阁所需多数。目前尚存三种组阁方式：(1)由社民党牵头，联合绿党和自民党组成“交通灯色”联合政府；(2)由联盟党牵头，联合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牙买加联盟”（对应于牙买加国旗的黑黄绿三色）；(3)由社民党和联盟党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由于社民党和联盟党均不愿意再次“联姻”，只有在前两种三党联盟组阁失利后，大联合政府才会被作为最后选项提出。

目前，究竟会组成“交通灯色”联合政府还是“牙买加联盟”，取决于绿党和自民党更愿意与谁联盟。由此，德国政局出现一个有趣现象，两个大党社民党和联盟党攫取总理宝座的命运，掌握在两个小党手上。

由于选举后社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有组阁谈判的优先权。绿党、自民党也顺应民意，表示将优先与社民党展开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交通灯色”联合政府一定能谈成。绿党和自民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社民党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让步。由于存在着与联盟党结盟，把社民党“做掉”的可能性，因此绿党和自民党拥有“哄抬”要价的资本。

然而，社民党未必能给予绿党尤其是自民党想要的高昂要价。一方面因为在社会政策、财政与税收政策上，社民党和自民党有着完全

不同的政策取向，另一方面，相对保守、偏右的朔尔茨还受到社民党内占主导的左翼势力牵制，使得他无法对自民党做出过多妥协。

无论如何，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中都会展现出谈判诚意，以便在万一出现谈判夭折的情况下，能将责任推卸给其他政党，以免被选民指责，而受到选民在民调以及后续州议会选举中的惩罚。

对于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而言，设法组建“牙买加联盟”，将是其延续政治生命的救命稻草。为此，他需要在这个非常时期，确保党内团结，保证联盟党的谈判实力。但是，联盟党内已经爆出各种杂音，认为联盟党不应再去争夺总理大位，而是应该承认选举失败，接受选民未授权联盟党组阁的事实，甚至要求拉舍特辞去基民盟主席的职务。这一方面是因为联盟党内原先就不满拉舍特的那些人，包括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想要把败选的责任归于拉舍特一人并逼退拉舍特，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拉舍特为求自保，会向绿党、自民党开出突破联盟底线的报价。

总体来看，社民党将选举胜势转化为执政机会的概率，相较于联盟党的组阁几率要高出很多，因此，在选战中刻意模仿默克尔的朔尔茨，也最有希望成为默克尔总理职位的接班人。但是，只要联盟党没有因为内斗而变得彻底没有组阁能力，那么组成“牙买加联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 谁能成为默克尔接班人

### 1

### “稳定器”失灵 “碎片化”加剧

**问：如何看待本次德国大选结果？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答：**根据大选初步结果，社民党以25.7%的得票率保住了民调的领先地位，得票率相比2017年的上届联邦议院选举增长了5.2个百分点。联盟党虽然在竞选最后关头出现支持率反弹迹象，并最终反映在24.1%的得票率上，仅比社民党少1.6个百分点，但依然只能屈居第二大党，而且此次得票率是联盟党历史上的最低纪录。

从得票率增幅来看，绿党无疑是大选的最大赢家，得票率相对于2017年增长5.8个百分点，但14.8%的得票率却无法让绿党感到高兴。因为此前绿党的民调支持率曾一度超越各党、成为有望赢得总理宝座的政党，而如今只能接受第三大党的地位。

和社民党、绿党一样，自民党也是大选赢家，得票率相对于2017年

微弱增长0.7个百分点。左翼党此番选举出现滑坡，没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好在它在柏林州和莱比锡获得了三个直接议席，能继续保留在议会中。除联盟党、左翼党外，另一个大选输家是德国选择党，10.3%的得票率比上届下跌了2.3个百分点。

从本次德国大选来看，德国政党格局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选举中候选人因素的影响凸显。此次社民党之所以能在竞选中后来居上，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最主要的因素是总理候选人朔尔茨的个人魅力。相对频出丑闻的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朔尔茨的沉稳可靠被视为“稀缺资源”。换言之，朔尔茨很大程度上是从竞争对手的犯错中得分了。而且朔尔茨也有意将自己塑造为具有默克尔那样稳健特质的人物以及默克尔政治遗产的继承人，这一竞

选策略无疑取得了成功。

二是德国政党体制的碎片化有所固化乃至加剧。在此次大选中，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依然保持在6个，考虑到本届选举后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党，各党之间的得票率差距缩小，这也意味着德国政党体制碎片化趋势有所增强。

三是全民党的衰落之势进一步加强。在往届德国选举中，至少联盟党的得票率总能保持在30%以上，成为德国政党体制中的“稳定器”。而在本次选举中，这一“稳定器”出现失稳状态，导致没有一个政党的得票率超过30%。在政党研究学者看来，30%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称得上全党的一个标尺。

而且，年轻人更为钟意绿党和自民党，而不是传统大党。

这些现象也预示着，大党不大、小党不小或许将成为德国政党体制的新常态。

### 2

### 默克尔的政治遗产能保住吗

**问：德国新政府内政外交上的政策走向如何？默克尔的政治遗产能够得到继承吗？**

**答：**默克尔从2005年起执政16年，给德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黄金十年”，欧债危机后德国在欧盟内部领导力的持续上升，以及德国在国际事务上从克制转向积极有为，这些可以说都是默克尔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是，这些政治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继任者继承，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鉴于德国未来的新政府大概率是三党联盟，而且是由左右不同阵营的三党组成，这就意味着，和默克尔时期相比，德国新政府的稳定性将大打折扣。新政府内部的政策协调需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各种矛盾也会更加频繁和激烈地爆发出来。新总理势必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总理，缺少默克尔那样的权威，尤其面对来自其他执政党的内阁时，控局能力有限。而且，这个三党联合政

府在相当长时间里不会在联邦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势必使得新政府的行动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许多迫切的改革事务却容不得新政府停滞不前。

如何尽快控制住疫情，实现德国经济在后疫情时期的稳健复苏，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虽然德国经济的韧性已在此前的危机中得到了验证，但是，德国经济的反弹力度依然受到国际范围疫情走势、供应链稳定性以及国内消费旺盛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民调显示，在此次大选中，决定选民投票行为的首要议题是社会保障。这也是由于疫情的持续发酵造成了德国失业率攀升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急需新政府采取措施，响应选民的关切。但是，由于执政各党来自左右不同阵营，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尚不得而知。而且，在默克尔任期内被贻误的数字化与绿色化结构转型，

也需要新政府拿出更大的魄力去推进。但恰恰在这两个议题上，左右翼政党的发力方向也有所不同，数字经济与数据保护之间以及经济发展和气候保护之间如何平衡，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自从德国在欧盟内扛起领导责任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作为以来，提高德国在欧盟以及国际范围的影响力几乎成为了德国主流政党的共识。未来三党执政联盟也将谋求继续在欧盟内部和国际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当然，它们也会在一些议题上，例如在欧盟内推行偏向于扩张型还是紧缩型财政政策上，存在不同意见，然而，相较内政而言，各党在欧洲与外交议题上的立场分歧会少一些。但一个在内政议题上已经意见不合、相互使绊子的政府，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形成在欧洲与外交政策上的合力，显然是令人存疑的。因此，在欧洲与外交政策上，德国新政府更可能给人留下一种有心无力之感。

# “全球英国”的野心与挥不去的“脱欧”阴影



朱联卫 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

最近，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外交领域为英国挣足了眼球。

9月15日，美英澳三国政府首脑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两国将为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舰队，抢走了法国尚未完成的常规潜艇订单。此举不仅将为英国带去数额可观的经济利益，也让英国参与到环太平洋地缘政治博弈之

中。紧接着，约翰逊9月21日抵达美国并与总统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商讨两国之间未来的合作，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言，再度呼应保守党政府自“脱欧”以来提出的建设“全球英国”的愿景。

不过，从外交角度来说，与澳、美、法三国相比，英国将自己卷入太平洋地区事务实属多此一举。

对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而言，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扩充军事实力，可以用作明年大选时自我吹嘘的政绩。对美国来说，支持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是重返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除了和英澳两国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之外，拜登政府还强化了过去十余年间毫无存在感的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被“抢单”

的法国不仅面临经济损失，海外领地周边还将出现核潜艇，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新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看似强化了英国与两个传统盟国之间的联系，但也忽视了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两个同样位于太平洋的英联邦国家的感受。再者，就算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与约翰逊通电话，为“抢单”之后的英法持续对话留下余地，但在英国“脱欧”尚遗留大量难题之际，做损害法国利益之事，算不上是为“脱欧”的后续谈判提供积极的外交环境。

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虽然以生产和部署核潜艇为表象，但本质上是外交关系，并不能解决英国“脱欧”面临的经济和内政困局。约翰逊与拜登的会谈没有实质性推进

英美贸易谈判的进程，身为爱尔兰人后裔的拜登，依然关注的是英国将如何处理“脱欧”议题中的北爱尔兰问题。

约翰逊虽然能用极限施压的方式逼迫欧盟让步，从而在谈判中获得优势，但面对拜登政府却显得谨小慎微，努力迎合，也就很难在北爱尔兰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之前，获得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强力支持，甚至可能因为处置不力而影响与盟友的外交关系。

建造核潜艇不比生产快速消费品，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进行准备并实施。对英美澳三国来说，国内政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有变数。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使得三国中有一方放弃这项计划，英国作为承建方会面临和现在的法国一样的尴尬

处境。加之潜艇很可能在苏格兰建造，一旦苏格兰政府再次启动独立公投并获得成功，英国要完成订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不仅可能无法按时履约，还要面临工厂迁址、转移技术、成本提高等等难题。

回看英国国内，在“脱欧”和新冠疫情双重影响之下，民众日常生活用品短缺、燃料短缺、医护人员和卡车司机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的新闻频频报端。即便核潜艇订单可以为英国提供就业岗位和经济上的收益，塑造大国形象，但从最新的民调来看，约翰逊近期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并未成为一剂有效的支持率“强心针”。当外交舞台的灯光熄灭后，站在内政舞台中央的约翰逊面对的依然是挥散不去并逐渐蔓延的“脱欧”阴影。